

小学语文高效课堂构建策略探析

宋其珠

二、优化课堂导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课堂导入的质量直接影响学生的课堂参与度，是高效课堂的重要开端。教师需结合教学内容，紧扣学生的心理特点，从学生熟悉的生活或认知领域切入，通过情境创设、话题互动、悬念设置等方式，自然引出学习内容。在《铺满金色巴掌的水泥道》教学中，教师以“童话与生活的美”为话题开展互动导入：“大家平时喜欢读童话，童话里有各种迷人的画面，那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生活中也藏着像童话一样的美呢？比如秋天的落叶、雨后的水洼。”在学生自由分享后，教师继续引导：“有一位作家在雨后的水泥道上，发现了像‘金色巴掌’一样的美景，还把它写成了优美的文章。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美景呢？今天就让我们跟着张秋生先生，一起走进《铺满金色巴掌的水泥道》，去寻找这份藏在生活里的美。”这样的导入既贴近学生的生活体验，又紧扣课文核心意象，同时设置了适度的悬念，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让学生带着“寻找生活中的美”的目标主动走进文本。

一、课前精准预设，夯实课堂学习基础

有效的预习是高效课堂的前提，能够帮助学生提前熟悉学习内容、明确学习难点，使课堂学习更具针对性。在《铺满金色巴掌的水泥道》教学中，教师可结合三年级学生的识字量与阅读理解能力特点，设计分层预习任务。基础层要求学生熟读课文，认识“洼、印、凌”等生字，会写“铺、泥、晶”等生字，并圈画文中描写水泥道和梧桐叶的语句；提高层要求学生借助工具书理解“凌乱、黏帖、明朗”等词语的意思，尝试用自己的话概括课文主要内容；拓展层要求学生观察生活中的自然景物，记录一处自己认为美丽的景色，准备课堂分享。预习任务布置后，教师应通过课堂随机提问、预习笔记抽查、小组内互查等方式做好预习反馈，梳理学生存在的共性问题（如对“黏帖”一词的理解偏差、对文中比喻句的赏析能力不足）与个别难点（如部分学生无法准确概括课文段落大意），并将这些问题融入课堂教学设计，使课堂教学直击学生的学习需求，从而大幅提升教学的精准度。

三、创新课堂教学方法，促进学生深度学习

课堂是高效课堂构建的核心阵地，教师需突破传统“教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中心设计多样化的教学活动，引导学生主动思考、自主探究、合作交流，实现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的转变。在《铺满金色巴掌的水泥道》教学中，教师可结合课文内容设计阶梯式问题链：“课文主要写了什么内容？作者在水泥道上发现了哪些景物？”——引导学生梳理内容、夯实基础；“作者把梧桐叶比作‘金色巴掌’，这个比喻妙在何处？文中哪些词句勾勒出梧桐叶与水泥道的美？”——组织学生合作探究，体会文字生动的表现力；“作者为何说水泥道像‘一块彩色的地

毯”？从这些细腻描写中，你能感受到作者对水泥道、对秋天怎样的情感？”——带领学生走进文本深处，体悟字里行间的情感温度；“生活中你还能将哪些景物比作有趣的事物？如果让你描写身边的一处美景，会选用哪些鲜活的词语与句子？”——鼓励学生学以致用，实现思维的拓展延伸。这样的问题链，能够在学生在思考与作答的过程中，不仅理清文本脉络，更能提升语言赏析与思维表达能力，使核心素养在课堂上真正得到发展。

四、优化教学评价，保障课堂教学实效

传统的标准化测试评价难以全面反映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发展水平，教师应构建多元化的课堂教学评价体系，既要关注学生的学习结果，更要重视学习过程，全面评价学生的知识掌握、思维发展、情感体验与实践能力。例如，在《铺满金色巴掌的水泥道》课堂教学中，教师需针对学生的课堂回答、仿写练习、分享展示进行及时、精准的点评，既要肯定优点（如“你准确找出了文中的比喻句，分析得很到位”“你的仿写抓住了落叶的颜色特点，比喻很生动”），也要给出具体的改进建议（如“如果加上对落叶触感的描写，句子会更丰富”“概括内容时可以更简洁一些”），评价语言以鼓励和引导为主。同时，可引导学生结合课堂表现，对自己的预习效果、问题回答、仿写练习进行自我评价，梳理收获与不足，培养自我反思能力。

构建小学语文高效课堂，是新课标背景下落实语文核心素养培养的必然要求，其核心在于始终坚持“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未来，教师还需灵活调整教学策略，结合课文特点与学生学情设计个性化的教学活动，引导学生主动参与、自主探究，实现全面发展。

（作者单位：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桃花源小学）

表演史论的双重书写与理论建构的自觉追求——评李梓郡《民族歌剧四十年》

刘倩

人物形象。

戴玉强作为“舞台表现的高度‘生活化’”的代表，其杨晓冬形象塑造体现了美声唱法中国化的成功实践。著者李梓郡通过对《不能尽孝愧对娘》中语气重音处理的细致分析，揭示了戴玉强如何将美声唱法的元音保持与民族唱法的依字行腔相结合，在“第二个娘”的换气处理中“展现出强烈的戏剧张力，顿时有入木三分”。

雷佳作为“‘写实’原则下的综合技术运用”的新生代代表，其“第四代喜儿”形象塑造体现了体验式表演与戏曲程式相融合的当代探索。著者特别关注雷佳在排演前赴河北平山“体验生活”的细节，指出这种“从生活出发”的创作方法，使其表演“既保存了传统戏曲重程式的一面……又吸收了现代舞台偏写实的”一面”。通过对《假似高山似仇海》中“恨”字“仇”字处理的细致分析，著者李梓郡揭示了雷佳如何通过“动词核心说”的把握，将情感表达与声音技术高度统一。

这些个案分析的共同特点，是将艺术家的表演实践置于中西文化碰撞、古今美学交融的宏观视野中进行考察，既关注技术层面的精微处理，又重视文化内涵的深度阐释。这种“从技艺到文化”的分析路径，为后续的理论建构奠定了坚实的实证基础。

三、理论建构的三维框架与艺术碰撞的方法论创新

如果说前两章主要是“史”的梳理与“人”的分析，那么第三章“新时期以来民族歌剧表演理论的探索”则体现了著者“论”的自觉追求。在这一章中，著者明确提出了民族歌剧表演艺术的三个初创理论：“文化碰撞理论模型及中西歌剧（戏曲曲艺）艺术碰撞论”“民族歌剧表演艺术的写实写意辩证统一论”“民族歌剧表演艺术的多元演唱技法兼善论”。这一理论框架的提出，标志着该书从经验描述走向理论建构的质的飞跃。

“文化碰撞理论模型”是该书方法论的核心创新。著者李梓郡借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资源，构建了一个四步骤的文化碰撞模型，用以描述西方歌剧（本土文化）与中国戏曲（母体文化）相遇、互渗、融合的动态过程。这一模型的核心洞见在于：它不是简单地将民族歌剧视为西方歌剧的中国变体，而是强调“中国民族歌剧的本体（母体文化）是中国戏曲艺术，而西方歌剧方是外来的因素（父本文化）”。这一理论翻转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它从根本上挑战了长期以来以西方歌剧为本位的认知定式，为民族歌剧的文化身份确认提供了坚实的理据依据。

著者李梓郡进而将这一理论模型运用于具体分析，指出中国民族歌剧“以传统戏曲板腔体结构为灵魂”的本体特征，并引用民间对《白毛女》《江姐》等民族歌剧称为“现代戏”的田野观察，为这一理论提供了生动佐证。这种将抽象理论模型与具体艺术现象相结合的论述方式，既增强了理论的说服力，也体现了著者扎实的田野功底与敏锐的问题意识。

“写实写意辩证统一论”与“多元演唱技法兼善论”则是文化碰撞论在表演美学层面的具体展开。前者揭示了民族歌剧表演如何在西方写实主义与中国写意美学之间寻求平衡，从早期“偏重本民族写意性”到后来“偏重移植西方写实主义”，再到21世纪“在具体表演实际中辩证采取最适合表演需要的写实写意性技法”的演进历程。后者则揭示了民族歌剧演员必须具备的超群兼容能力——不仅要能在“民、美、通”之间转换驾驭，更要“在多种来自天南地北的民族戏曲曲艺唱法中实现多元腔调的驾驭转换”。著者将这一特征概括为“兼善多元演唱唱法技术的‘熔炉’”，形象地道出了民族歌剧表演艺术的独特难度与魅力。

在随后的三节中，著者李梓郡分别从“与戏曲结缘”“容纳西方歌剧质素”“建构表演理论的基本路径”三个维度，对上述理论框架进行了具体展开。这些论述既注重对传统资源的深入开掘——如对戏曲“唱念做”表演体系的系统梳理；又重视对西方经验的合理吸收——如对“声台形表”表演理论的借鉴运用；更强调在“求同与存异”中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表演理论——如“以戏曲声腔诠释人物性格”“以体验派说表演人物情感”“以虚实结合塑造人物形象”。这种中西互参、古今融通的论述方式，使该书的理论建构既具有开放的学术视野，又保持清晰的本土立场。

四、教育维度与现实关怀的深层关切

作为一部兼具学术深度与实践品格的著作，《民族

歌剧四十年》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历史梳理与理论建构层面，更体现在对当下艺术教育的深层关切。第四章“民族歌剧表演艺术的现状与前景”，直面民族歌剧“人才匮乏”的现实困境，从审美引导、一度创作、二度创作、培养模式等多个维度展开深入剖析，体现了著者强烈的现实关怀与建设性思考。著者李梓郡敏锐地指出，当前歌剧演出队伍中“90%以上都是各地高等院校声乐系、声乐歌剧系或音乐剧系培养的毕业生，除了极少数表演者能够胜任表演艺术的高度综合性要求。担纲主演之外，其他绝大部分，皆因表演或歌唱等某一方面技能存在明显弱项或缺项”。这一判断直指当前艺术教育的结构性缺陷——专业细分带来的技能割裂，使得“会‘歌’不会‘演’、会‘演’不会‘歌’”的现象日益严重。

针对这一问题，著者从多个层面提出了建设性思考。在培养模式方面，著者李梓郡呼吁建立“适合民族歌剧舞台表现的演员培养模式”，主张借鉴戏剧人才培养的完整体系，使演员“深入戏曲、民歌、说唱等传统艺术学习，兼收话剧、音乐剧、舞剧等形式，借鉴西方歌剧表演艺术形式”。在教学改革方面，著者李梓郡提出“开门办学”的思路，建议音乐院校与戏曲学院开展学分互认、资源共享，帮助学生“在学习和交流中加深对自我专业的理解，也能探索并掌握更多的表演手段”。在院团合作方面，著者李梓郡强调院校与院团应“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友好合作、共同发展”，建立长效合作机制。

这些思考体现了著者对民族歌剧传承发展的深切关怀，也赋予该书以鲜明的教育品格。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著者李梓郡将这一问题提升至“文化自信”的高度，指出“疏于对民族歌剧形式的探索正在制约着中国歌剧生态体的快速发展……学校和相关团坚守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的基本底线，也是发展中国民族歌剧表演艺术文化传统的基本原则”。这种将艺术教育与文化战略相结合的论述，使该书对教育问题的探讨超越了单纯的教学改革层面，而具有了更远的文化意义。

五、学术贡献与范式意义

其一，填补了改革开放以来民族歌剧表演艺术系统研究的空白。首次以专著形式对这一时期的民族歌剧表演艺术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将表演艺术从一度创作的附属地位提升为独立的学术研究领域，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与理论框架。

其二，建构了具有原创性的理论分析框架。“文化碰撞理论模型”的提出，为理解中西艺术交融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工具；“写实写意辩证统一论”与“多元演唱技法兼善论”的阐发，则揭示了民族歌剧表演艺术的内在规律与美学特质。这一理论框架的建构，标志着民族歌剧研究从经验描述走向理论自觉。

其三，提供了“学科史”书写的范本。该书将民族歌剧表演艺术置于百年中西文化碰撞、四十年改革开放历程的宏观视野中进行考察，既注重对艺术内部规律的揭示，又关注外部语境的影响制约，体现了“内史”与“外史”相结合的研究路径，为相关领域的学科史书写提供了方法论参照。

其四，彰显了学术研究的现实关怀。该书对民族歌剧人才困境的直面、对艺术教育问题的剖析、对培养模式改革的思考，都体现了著者李梓郡将学术研究服务于文化建设的自觉追求。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术品格，使该书既具有学术深度，又具有实践温度。当然，作为一部开拓性的著作，该书也存在若干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空间。例如，在个案选择上，四位主要艺术家中女性占三位，男性仅一位，虽有其历史合理性（民族歌剧确以女性角色塑造见长），但对男性表演艺术家的整体关照似可进一步加强。又如，在理论建构层面，“文化碰撞理论模型”主要聚焦于中西关系，对民族歌剧与少数民族艺术、与地方戏曲多样性的关系着墨不多，这或可成为后续研究的拓展方向。此外，该书对表演艺术本体——如声音的声学分析、身体的运动规律等技术性分析相对简略，未来或可与表演科学等交叉学科展开对话。

但瑕不掩瑜，《民族歌剧四十年》以其扎实的史料梳理、精当的作品分析、深刻的理论洞见和鲜明的现实关怀，为中国民族歌剧研究树立了新的标杆。它不仅为民族歌剧的研究者、表演者、教育者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资源，还为所有关心中国艺术理论建设与跨文化交流的读者提供了深刻的思考启示。

（作者单位：广东海洋大学中歌艺术学院）

在中国当代艺术研究的版图中心，民族歌剧始终是一个充满张力与魅力的领域。它既承载着“舶来”的西方歌剧基因，又深植于中国传统戏曲、民歌的文化土壤；既是红色革命文化的艺术呈现，又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审美形式。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民族歌剧的研究多集中于一度创作的历史梳理或单一作品的文本分析，对二度创作——尤其是表演艺术的系统研究相对薄弱。李梓郡所著的《民族歌剧四十年》（中国戏剧出版社2022年出版）正是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标志性成果。该书以改革开放四十年为时间跨度，以“文化自信”为理论视域，将民族歌剧表演艺术从技艺描述提升至理论建构层面，为当代中国民族歌剧研究提供了兼具学术深度与实践品格的范本。

一、选题的学术价值与理论自觉

《民族歌剧四十年》的选题立意，体现了著者李梓郡敏锐的学术洞察与深沉的学科关怀。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是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四十年，也是民族歌剧在多元文化冲击下艰难探索、创新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然而，正如著者在绪论中所言，“围绕新时期以来歌剧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界定，并对这一历史阶段中国民族歌剧表演艺术的梳理或从表演艺术角度审视中国当代歌剧艺术发展史的专题研究，远远滞后于这一时期对于文学史、戏剧史等方向的学术研究”。这一判断准确把握了当前民族歌剧研究的结构性质缺失——表演艺术作为歌剧综合体的核心环节，其历史经验与理论资源长期处于零散化、边缘化的状态。

该书的学术价值，首先体现在对研究对象明确界定与概念体系的严谨建构。李梓郡在“相关概念界定”部分，对“中国歌剧”“中国民族歌剧”“民族歌剧表演艺术”三个核心概念进行了逐层辨析，将研究对象界定为“狭义范畴中的中国民族歌剧表演艺术”。这一界定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它一方面避免了“中国歌剧”这一宽泛概念带来的边界模糊，另一方面也廓清了民族歌剧与正歌剧、音乐剧等其他歌剧类型的本质区别——“在音乐戏剧性展开的方式上，主要运用传统戏曲板腔体的音乐结构和叙事发展手法写主要人物的艺术”。这种概念上的“正本清源”，为全书的理论建构奠定了坚实的逻辑基础。

更为可贵的是，著者李梓郡将这一研究置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盘整与回归：中国民族歌剧表演理论探索研究”的学术框架之中。项目名称中的“盘整”与“回归”两个关键词，精准概括了该书的学术追求：“盘整”意味着对四十年表演实践的系统梳理与经验整合，“回归”则指向对民族歌剧本体特征的重新确认与文化自信的自觉觉醒。这种将个人研究纳入学科整体发展格局的学术自觉，使该书超越了单纯的史论写作，而具有了学科建设的意义。

二、历史脉络与个案深描的双重书写

《民族歌剧四十年》的框架结构呈现出“总—分—总”的严谨逻辑。全书共分四章，第一章以宏观视角勾勒新时期以来民族歌剧表演艺术的发展脉络，第二、三章以个案深描与理论提升的方式展开纵深探讨，第四章则直面现状问题并提出建设性思考，最后以结语收束全篇。这种结构安排既保证了历史叙述的完整性，又兼顾了理论分析的深度。

第一章“新时期以来民族歌剧表演艺术发展概述”，将四十年历程划分为“复苏与继承（1976—1996）”“借鉴与融合（1996—2006）”“创新与发展（2006—2016）”三个历史阶段。这种分期方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不是简单的时间切割，而是以政治语境变迁、艺术思潮演进、创作观念转型为内在逻辑，揭示了民族歌剧表演艺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美学特征与发展动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著者对每一阶段的论述都聚焦于代表性剧目——《党的女儿》标志“多元探索”的开启，《野火春风斗古城》见证“借鉴与融合”的深化，《白毛女》《江姐》《小二黑结婚》等经典剧目的多次复排则构成“创新与发展”的实践场域。这种以点带面的叙述策略，使宏观历史脉络获得了具体的艺术质感。

第二章“新时期以来民族歌剧表演艺术家个案研究”，是全书的精彩篇章。著者李梓郡选取戴玉强、雷佳等具有代际代表性的表演艺术家，进行了深入的个案分析。这些不是简单的艺术履历罗列，而是从“表演艺术”的核心问题出发，聚焦于艺术家分析如何通过具体的唱腔处理、形体动作、情感体验来塑造

人物形象。

戴玉强作为“舞台表现的高度‘生活化’”的代表，其杨晓冬形象塑造体现了美声唱法中国化的成功实践。著者李梓郡通过对《不能尽孝愧对娘》中语气重音处理的细致分析，揭示了戴玉强如何将美声唱法的元音保持与民族唱法的依字行腔相结合，在“第二个娘”的换气处理中“展现出强烈的戏剧张力，顿时有入木三分”。

雷佳作为“‘写实’原则下的综合技术运用”的新生代代表，其“第四代喜儿”形象塑造体现了体验式表演与戏曲程式相融合的当代探索。著者特别关注雷佳在排演前赴河北平山“体验生活”的细节，指出这种“从生活出发”的创作方法，使其表演“既保存了传统戏曲重程式的一面……又吸收了现代舞台偏写实的”一面”。通过对《假似高山似仇海》中“恨”字“仇”字处理的细致分析，著者李梓郡揭示了雷佳如何通过“动词核心说”的把握，将情感表达与声音技术高度统一。

这些个案分析的共同特点，是将艺术家的表演实践置于中西文化碰撞、古今美学交融的宏观视野中进行考察，既关注技术层面的精微处理，又重视文化内涵的深度阐释。这种“从技艺到文化”的分析路径，为后续的理论建构奠定了坚实的实证基础。

三、理论建构的三维框架与艺术碰撞的方法论创新

如果说前两章主要是“史”的梳理与“人”的分析，那么第三章“新时期以来民族歌剧表演理论的探索”则体现了著者“论”的自觉追求。在这一章中，著者明确提出了民族歌剧表演艺术的三个初创理论：“文化碰撞理论模型及中西歌剧（戏曲曲艺）艺术碰撞论”“民族歌剧表演艺术的写实写意辩证统一论”“民族歌剧表演艺术的多元演唱技法兼善论”。这一理论框架的提出，标志着该书从经验描述走向理论建构的质的飞跃。

“文化碰撞理论模型”是该书方法论的核心创新。著者李梓郡借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资源，构建了一个四步骤的文化碰撞模型，用以描述西方歌剧（本土文化）与中国戏曲（母体文化）相遇、互渗、融合的动态过程。这一模型的核心洞见在于：它不是简单地将民族歌剧视为西方歌剧的中国变体，而是强调“中国民族歌剧的本体（母体文化）是中国戏曲艺术，而西方歌剧方是外来的因素（父本文化）”。这一理论翻转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它从根本上挑战了长期以来以西方歌剧为本位的认知定式，为民族歌剧的文化身份确认提供了坚实的理据依据。

著者李梓郡进而将这一理论模型运用于具体分析，指出中国民族歌剧“以传统戏曲板腔体结构为灵魂”的本体特征，并引用民间对《白毛女》《江姐》等民族歌剧称为“现代戏”的田野观察，为这一理论提供了生动佐证。这种将抽象理论模型与具体艺术现象相结合的论述方式，既增强了理论的说服力，也体现了著者扎实的田野功底与敏锐的问题意识。

“写实写意辩证统一论”与“多元演唱技法兼善论”则是文化碰撞论在表演美学层面的具体展开。前者揭示了民族歌剧表演如何在西方写实主义与中国写意美学之间寻求平衡，从早期“偏重本民族写意性”到后来“偏重移植西方写实主义”，再到21世纪“在具体表演实际中辩证采取最适合表演需要的写实写意性技法”的演进历程。后者则揭示了民族歌剧演员必须具备的超群兼容能力——不仅要能在“民、美、通”之间转换驾驭，更要“在多种来自天南地北的民族戏曲曲艺唱法中实现多元腔调的驾驭转换”。著者将这一特征概括为“兼善多元演唱唱法技术的‘熔炉’”，形象地道出了民族歌剧表演艺术的独特难度与魅力。

在随后的三节中，著者李梓郡分别从“与戏曲结缘”“容纳西方歌剧质素”“建构表演理论的基本路径”三个维度，对上述理论框架进行了具体展开。这些论述既注重对传统资源的深入开掘——如对戏曲“唱念做”表演体系的系统梳理；又重视对西方经验的合理吸收——如对“声台形表”表演理论的借鉴运用；更强调在“求同与存异”中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表演理论——如“以戏曲声腔诠释人物性格”“以体验派说表演人物情感”“以虚实结合塑造人物形象”。这种中西互参、古今融通的论述方式，使该书的理论建构既具有开放的学术视野，又保持清晰的本土立场。

四、教育维度与现实关怀的深层关切

作为一部兼具学术深度与实践品格的著作，《民族

数字技术赋能高校治理现代化的逻辑机理与实现路径

张俊霞

随着教育数字化战略的系统推进，数字化转型正逐步成为推动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数字技术的广泛嵌入与深度融合正在重塑高校的教学形态、科研范式与管理机制，这已然成为“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关键突破口”。数字技术的深入发展为高校治理理念的更新、治理结构的优化、治理方式的转型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条件与实践可能。

一、数字技术赋能高校治理现代化的逻辑机理

数字技术赋能高校治理现代化，是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导，引发高校管理人员在治理理念、结构、方式和能力上的系统性重构。首先从治理主体层面来看，传统高校治理中，教务、科研、人事、学生、财务、资产等各业务系统条块分割，容易形成“信息孤岛”“数据烟囱”困境，数字技术能够打破“管理者—被管理者”的思维定式，实现数据驱动的治理，促进跨部门、跨业务、跨系统的数据互联互通，使得高校能够从整体视角把握大学治校的运行状态，为数据驱动的精准治理奠定基础。其次，从治理技术层面来看，数字技术的脱域性、即时性等优势能更好地服务于决策支持。高校治理中可追溯的海量数据通过深度处理与智能分析，能够支撑精准治理。在教学管理、资源配置等方面，基于多维数据的资源使用效率分析，有助于治理主体摆脱以往经验的束缚，促使高校决策走向“数据支撑+智能分析”，有效提升治理决策的科学性和智能化水平。最后，从治理战略层面来看，数字技术的应用使高校能够对教学运行、科研进展、学生发展、资源使用等治理领域进行全过程的实时监测与智能预警，有效打破治理主体间的信息障碍和壁垒，促使高校管理者、教师、学生等进行协同交流，从而拓展高校治理的边界，使高校治理从事后应对走向事前预警、事中干预，强化过程管控，实现治理方式从静态粗放向动态精准的转变。

二、数字技术赋能高校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困境

尽管数字技术为高校治理现代化带来了重要机遇，但在实践中受各种因素影响，仍面临诸多挑战。一是数据壁垒依然存在。许多高校内部各业务系统数据标准不统一，导致数据整合难度大、共享程度低，数据价值难以充分释放，数字技术应用局限于简单业务功能。部分高校的数字技术应用停留在办事流程电子化、信息发布等浅层面，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深度应用较少，技术对治理决策的支持有限。二是顶层设计不足，导致制度规范相对滞后。数字技术驱动治理变革对传统的规章制度、管理流程、权责体系提出了挑战。然而，相应的制度调整、规范建设、权责划分未能及

时跟进，导致技术与制度的匹配度不高。

三是高校治理主体数字素养参差不齐。当前高校治理仍囿于传统科层制管理模式，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局面尚未形成。高校管理

三、数字技术赋能高校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数字基础设施是技术赋能的前提条件，必须夯实数字基础设施，才能筑牢技术底座。高校应从战略高度加大投入，统筹规划校园网络环境升级与治理场景的深度融合。一方面，要确保网络的高速、泛在，打破信息孤岛，实现教学、科研、管理、服务全链条数据的实时流通与汇聚，为“一网通办”和“一网统管”提供畅通无阻的传输通道；另一方面，更要筑牢网络安全数据安全防护，建立全方位的安全防护体系，保障师生个人信息和核心业务数据的安全可控。

数据是数字治理的核心要素，高校应构建“一数一源、一源多用”的数据标准体系，明确各类数据的采集规范、质量要求和责任主体，构建数据治理体系、激活数据价值。搭建校级数据中台或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实现跨部门数据的汇聚整合和互联互通。建立健全数据质量管理机制，对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及时性进行常态化监测和治理。

数字技术赋能治理的效果，最终取决于人的应用能力。高校应将数字素养纳入管理人员的常态化培训体系，开展分层分类的数字技能培训，提升管理队伍的数据意识、技术应用能力和信息安全意识。鼓励管理人员在实践中学习，在应用中提升，培养既懂管理业务又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同时，要加强师生的数字素养教育，提升全体师生参与数字化治理的能力和意愿，推动管理方式从“管理本位”向“服务本位”转变，以数字化手段提升服务体验。

此外，技术变革必然要求制度创新，健全制度保障机制，才能营造良好的高校治理生态。高校应建立健全与数字化治理相适应的制度规范体系，建立适应数字化治理过程的评价考核机制，完善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管理机制，确保治理数字化转型在安全可控的轨道上运行。唯有将技术逻辑与治理逻辑深度融合，让数字技术真正服务于师生发展，才能实现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培养时代新人、推动高等教育创新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作者单位：运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5年度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思想政治教育专项）一般项目：从“体重重管理”到“心理赋能”：政策驱动下大学生体重管理行为的心理转化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5ZSSZSX122）

文以载道，语以化人——蕴含在初中语文教材中的德育研究

韩旭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22年版）》（以下简称“新课标”）明确提出，语文学科要以培养新时代青少年的家国情怀与时代使命担当为育人导向，推进“素养育人”与“德育育人”的深度融合。语文作为一门兼具工具性与人文性双重属性的基础学科，是培育学生思想品德的天然载体。依托学科属性与教学内容，将德育自然渗透在学科教学的过程中，可以充分激发“文以载道，以德育心”的育人内涵。

一、初中语文教材中德育资源的类型与分布

统编版初中语文教材的选文兼顾经典性、适切性与时代性，有机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构成了丰富且完整的德育教育资源。从价值目标与道德培育的角度来看，语文教材中德育资源的总体布局如下：七年级语文教材以贴近生活、情感浸润、道德启蒙为核心，整体呈现出推己及人、由家到国、从自然到生命的新进式道德培育路径；八年级则侧重引导学生拓展社会视野、深化理性思考、增强文化认同，德育重心从个人修养转向社会公德与文化传承，进一步拓宽了道德视野；九年级以家国天下、人生价值、时代使命为目标，聚焦理想信念、价值立场与使命自觉，将个人发展融入国家命运与时代洪流，完成价值定型与升华。总体而言，教材形成了从“修身立己”到“齐家立世”再到“爱国担当”的完整德育闭环。

语文教材中的内容与主题可抽象为三类道德形象，分别为传统美德、革命精神和时代担当，实现从道德启蒙到精神引领的进阶。三大类别相互衔接，螺旋上升，将抽象的价值观念变得可感可触，契合青少年成长规律。

在中华传统美德浸润方面，《论语》十二章》《陋室铭》《最苦与最乐》《精神的三间小屋》等课文围绕诚信、乐观、敬业等核心价值要点展开。单元教学中，七年级上册第四单元“人生之舟”主题引导学生领会人生意义与生命价值，八年级下册第三单元“陶冶情操”主题引导学生感悟古人对美的认知与追求，九年级上册第一单元“活动·探究”主题“诗意图家”则引导学生热爱祖国、珍视生命。

在革命精神传承方面，既有以磅礴气势歌颂中华民族伟大坚强精神的《黄河颂》，也有以信天游形式抒发对革命圣地深情的《回延安》。整本书记阅读中，纪实作品《红星照耀中国》展现了革命领袖与普通红军战士的理想信念和精神风貌，红色经典小说《红岩》刻画了用生命捍卫革命真理的革命志士，外国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则讲述了贫苦少年成长为钢铁般革命战士的历程。

在时代精神弘扬方面，教材通过展现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传递时代价值，入选《邓稼先》

三、结语

统编版初中语文教材构建了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革命文化为内核、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导向的德育资源体系，形成契合初中生成长规律的德育闭环。站在新课标引领的教育新起点，语文科德育任务任重道远。只有持续深挖语文教材中的德育资源，创新德育激活的方式和路径，才能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不息，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让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熠熠生辉。

（作者单位：上海市闵行区莘松中学）